2026年11月9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连晓芳
电话:010-64299522 E-mail:zgwhb2017@126.com
中国文化报

探展

文物无声,岁月有痕。文博展览以器物为钥匙,解锁古今文明密码、串联中西文化脉络,让历史文脉可看、可感、可悟。本期“探展”栏目关注近日开幕的三场展览,跨越地域与主题,以多元展陈视角,呈现文物承载的文明力量与时代价值。从溯源本土文明、对话世界文化,到解读精神内核,三场展览创新文博叙事方式,让人们在沉浸式观展中传承文化根脉、感知古今变迁。

盐池与铜矿:

解码“大河之东”的文明之路

本报记者 刘源隆

运城地处山西省西南部,位于黄河东岸,古称河东。这里光照充沛、土地肥沃,涑水河、亳清河等河流交错,为早期农耕提供了肥沃土壤。日前,一场聚焦这片土地的展览“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肇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将这片土地与中华文明肇兴的关系呈现在观众面前。

本次展览以资源为核心,从古代聚落考古的角度串联起运城地区重要考古发现,精选200余件(套)展品,展现运城从新石器时代到两周时期的历史脉络。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研究馆员、田野考古研究所所长田伟介绍:“从仰韶文化时期社会开始出现分层和复杂化的迹象,到龙山时代早期权力结构逐渐形成,再到夏商时期早期国家的资源控制与管理,直至两周时期的礼制逐渐确立,展览充分展现出运城与中华文明兴起、演进的紧密关系。”

故事从仰韶时代讲起。1916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山西运城垣曲寨里村发掘出中国第一块始新世哺乳动物化石;5年后,他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确认“仰韶文化”,由此拉开中国考古学序幕。198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学者在距垣曲寨里村仅数公里的古城东关遗址发掘出“东关一期”遗存,成为探源仰韶文化的重要实证。田伟说,这些发现既把“发现仰韶”的动力与“仰韶之源”的答案系于运城,也彰显了这片土地在还原史前历史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这段考古史,在展柜中的器物上变得具体可感。展柜中,陶小口平底瓶吸引观众停下脚步。这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初期器物出土于垣曲县古城东关遗址。田伟表示,它是仰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陶器之一,主要流行于黄河中游地区。部分个体残留物分析发现残留有淀粉粒、酵母、霉菌、酒石酸,可能用于酿造谷芽酒、曲酒。



▶ 彩陶盆

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彩陶是仰韶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山西永济市晓朝遗址出土的一件彩陶盆是本次展览的重点展品之一,其造型优美,彩纹为几何形花纹,由圆点、中间粗两端细的曲线、凹边三角形等构成,整体富有韵律。一位观众在彩陶盆前感叹:“这图案看起来好有现代感啊!”

沿着展线前行,历史进入龙山时代。田伟介绍,仰韶文化之后,晋南地区成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及至龙山时代,晋南地区社会分层和复杂化程度不断加深,资源不断向大型聚落集中,襄汾陶寺、绛县周家庄先后发展成中原及周边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在这些聚落兴起的背后,盐业资源扮演了重要角色。运城盐池古称盬海、古海,因位居黄河以东而称河东盐池。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范文谦指出,盐是早期社会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仰韶早期,原本并不适合农耕的盐池周边突然出现大量聚落,说明先民们为了盐来到这里;盐还可用于交换绿松石、玉器,周代贵族甚至到南方用盐来换铜。

当历史进入夏商时期,铜成为焦点。从青铜时代的早期至春秋时期,处在黄河与涑水河之间的中条山成了中国早期的重要铜矿产区。范文谦表示,夏商周三代是青铜时代,铜是支撑国之大事的战略资源,既可铸造青铜器,也可铸造兵器;夏和商代前期,中原王朝用的铜料主要来源于运城的中条山地区,商代前期偏晚阶段才开始向南方寻找其他铜源。“铜器在仰韶时代数量很少,主要是小型装饰品,到了龙山时代才作为礼器,且早期铜礼器大多是模仿玉礼器或陶礼器制作的。”范文谦说。

展览的尾声,来到两周时期。周灭商后,周朝以都城为中心分封诸侯,依靠宗法和礼乐制度,建立起拱卫王室、稳定天下的政治格局,中华文明进入“以礼治天下”的时代。

绛县横水西周墓地是西周时期重要的封国墓地,墓中出土的器物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礼制。展厅中,一件青铜甗精美非常,名为“芮伯作王姊”,出土于绛县横水墓地2158号墓。器内壁靠近口沿的地方铸有铭文,大意是:芮伯恭敬叩拜,为周王的姐姐制作了这件器物。铭文里的“王姊”,指的就是周王的姐姐。有学者推测,这位周王的姐姐嫁给了倗伯,芮伯作为周王的宗亲,专门做这件青铜器给她陪嫁。这座墓的墓主为倗国国君倗伯,可能是甲骨文中常说的“鬼方”的后裔。墓里发现俯身葬、殉人、腰坑等商代常见的埋葬习俗,说明倗氏最晚到商代晚期已经融入中原文化。

在田伟看来,运城作为资源、聚落与制度演进的重要现场,盐池、铜矿、土地与河流,让这里在史前至两周时期持续吸引人群、汇聚财富、催生权力。“希望本次展览能够带领广大观众走进大河之东的历史深处,深入理解运城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独特作用与重要地位,感受体悟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田伟说。



铜镜,又称照子、铜鉴,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清代,绵延4000余年。它反映古人冶金之精,也照见历代的物质风华与思想文脉。铜镜最独特的文化身份,在于它从“照形”走向了“照心”。唐太宗一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将一件梳妆用具升华为察己、知史、照人的“心镜”。

铜镜中的廉洁密码

本报记者 刘海红

正在浙江兰溪市博物馆展出的“三江镜鉴·铜镜中的廉洁密码”特展顺着“心镜”线索,挖掘铜镜中蕴含的“廉洁密码”。90余面汉代至明清时期的古铜镜搭配兰溪宗谱、铜印与老物件,分为“尚方天地”“铭以载道”“画面有意”“以人为镜”4个单元,带领读者通过铜镜的形制、铭文、纹饰、人物,去观其形、读其文、品其纹,最后“走”进铸镜、用镜人的故事中。

兰溪市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郑建明介绍,展览采用明暗双线叙事,明线以铜镜文物为根基,从造型规矩、劝诫铭文、象征纹饰、古今人物4个维度系统解读。暗线贯穿“寻密—解密—破密”探索式观展逻辑,有机融入兰溪本土清官廉吏事迹、传世家规家训,推动青铜文物与当地文化深度相融。

郑建明介绍,“尚方”是秦代始置、汉代沿用的皇室官署,专造御用器物。汉代流行的规矩镜,镜背饰有类似T、L、V形状的3组符号,学界称为“博局纹”;内方外圆的布局铸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是“天圆地方”的微缩表达。在“尚方天地”单元,浙江省博物馆藏汉几何纹规矩镜、安吉县博物馆藏东汉四神博局纹镜,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直观地表达出来。金华市博物馆藏“婺州官铸造监”铭文镜,将监造机构、责任要求铸于镜背,是《考工记》“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印证。器物有源可溯、有责可究,这套官营手工业的质量追溯机制,被视为“古代制度保廉的雏形”。

汉代人有把座右铭铸在镜缘的历史,在“铭以载道”单元,安吉县博物馆藏西汉“清白”连弧纹镜铸“絜清白而事君”、西汉姚皎光重圈铭文镜内圈铸“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表达了汉代人“以镜自省、以铭自警”的修身自觉。兰溪市博物馆藏隋代“赏得秦王镜”铭文:“赏得秦王镜,判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特是自明心。”诠释了“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生活智慧。金华市博物馆藏清薛晋侯造铭文方形铜镜以“既虚其中,亦方其外,一尘不染,万物皆备”直抒人格之方正澄明,即内心虚静空明,立身方能端正笔直。

唐宋时期铜镜上流行铸莲、菊、鱼等自然元素和人物故事。在“画面有意”单元,南阳市博物院藏金双鱼戏水纹铜镜以双鱼戏水纹寄寓“鱼水之情”,体现了古人“民为邦本、政通人和”的治世理想。金华市博物馆藏西晋“孔子四弟子纹镜”是目前所见唯一明确标注孔子及弟子身份的铜镜;唐代“真子飞霜镜”铸的是“高士抚琴、清逸自守”的图景,那些被古人看了成百上千遍的人物故事,在铜镜中化为一部梳妆台上的“德育读本”。

在“以人为镜”单元,焦点从器物切换到人。唐代宰相舒元舆以“剑之锷,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扬”家训嘱咐其弟,清白的名声、正直的品格要靠日复一日的自省、自砺、自律,像磨剑一样磨出来。明代南京礼部尚书章懋归乡讲学于枫山书院,晚年住在低矮的旧屋里,踱步常蹭掉纱帽,临终“家无余财”,他的家训“传家两字,曰耕与读;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安家两字,曰让与忍”,从立身、持家到处世,尽显一位清白官员最朴素也最坚固的精神底色。

展览还展出了《兰溪历代清官谱》,从唐代滕珣到近代的黄受谦、邵溥慈,他们前后相续,把“廉”从一家一族的家规祖训,推广为三江之畔的乡邦共识,为后世为官者留下了一面可照、可鉴、可学的镜子。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还依托多色系光影营造沉静庄重的展陈氛围,配套规矩拼图、铭文拓印等主题化互动体验,让铜镜文物“开口说话”,为观众自主探寻提供路径。



▲ 西汉尚方十二地支禽兽博局镜
安吉县博物馆藏

◀ 唐葵形鸳鸯荷花纹铜镜
南阳市博物馆藏

从景德镇到斯塔福德郡:

一窑火的世界回响

本报记者 付远书



▲ 展览现场

▲ “第一日”陶瓷瓶
成都博物馆供图

近日,“窑火中的艺术匠心:V&A博物馆珍藏威基伍德陶瓷”在成都博物馆启幕。作为成都博物馆和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联袂呈现的特展,也是其全国巡展首站,展览展出英国V&A博物馆、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馆藏珍品共202件。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英国瓷器来蓉”,而是以威基伍德为切口,把中国瓷西传、欧洲仿烧、工业革命与现代社会审美变迁串成一条可观看的文明对话线索。

展览的时间节点颇具意味。2026年7月25日,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瓷器作为人类贸易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商品,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重洋,在欧洲掀起持续百年的“中国风”,也引发长达数个世纪的破解与模仿、融合与创新。据史料记载,17世纪中国瓷器便大规模输往欧洲,塑造了全球陶瓷贸易的基本格局;1708年,德国迈森成功烧制硬质瓷,1712年,欧洲人辗转从景德镇获得秘制瓷配方及技术,法国塞夫勒、英国切尔西等瓷厂相继成立。欧洲由此从瓷器输入者转变为瓷器生产的新兴力量。威基伍德的故事,正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

因此,展览的叙事重点不只是“名瓷”,而是“实验”。展览以时间为线索,以陶瓷器的发展阶段划分篇章,串联起260余年英国陶瓷历程。开篇“艺术的实验场”把观众带回18世纪英国:约书亚·威基伍德一世将实验科学方法引入制陶业,实验笔记本以密码书写,记录近7000次系统试验;他改良奶油色陶器,获夏洛特王后青睐更名为“女王陶”,又发明黑色玄武陶与碧玉细炻器,并发明高温计,使烧制从“手感”走向“科学测量”。这些内容让展览具有一条清晰的技术史线索:英国传统陶瓷手工业迈向现代工业,并非一句“工业革命”可以概括,而是由一次次试验、一次次测量和一次次工艺改良累积而成。

展品也沿着这条线索展开。唯一由约书亚·威基伍德亲手制作的“第一日”陶瓷瓶,采用黑色玄武陶,模仿古希腊陶器风格,被命名为“第一日”,以此纪念他所创立的伊特鲁利亚工厂;夏洛特王后肖像徽章以钴蓝胎体配鎏金圆框,白色浮雕居中,呈现碧玉细炻器的宝石质感。再往后看,波特兰花瓶初版复刻件持续近5年、耗费数千次试验,白色浮雕凸显于深色底色之上,既是对古罗马艺术的致敬与复兴,也被时人视作英国陶瓷工艺的巅峰之作。

展览没有把陶瓷只当作陈设品,而是把它放回社会生活中。“风物的回应”篇章展现陶瓷器作为实用器如何引领社会时尚:在消费主义逐渐成形的英国社会,饮茶文化从宫廷蔓延至城镇,餐桌器物成为社会身份的注脚,新古典主义等社会思潮被具象化呈现在器物之上。著名的“青蛙餐具”由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定制,29位画师手绘1222幅英国景观,成为研究18世纪英国园林与建筑的重要图像档案。

威基伍德一世去世后,其家族成员继承其事业与理念,“持续的变奏”篇章讲述两个世纪以来的变革与创新:19世纪科技变革、铁路与汽船带来的商路拓展、异域艺术影响、20世纪对手工艺传统的复兴,以及莎士比亚和司各特的文学叙事,都让陶瓷审美呈现多元面貌。到了“对话与新生”部分,1940年巴拉斯顿新工厂落成,电力隧道窑取代燃煤窑炉,现代主义、波普艺术、当代设计、驻厂艺术家实验创作和21世纪多领域跨界对话为品牌注入新生,历史档案与藏品的系统保存则持续为新一代创作者提供灵感。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展览具有“桥”的意义。V&A是英国四大核心国立博物馆集群之一,馆藏规模位列英国第二大国立博物馆,威基伍德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档案之一。本次展览是成都国际友好城市博物馆网络的又一次成功实践,也为中国观众打开一扇了解英国陶瓷艺术与工业革命的窗口。成都博物馆此前已与法国国家凯布朗利博物馆、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等开展合作,此次与V&A携手,标志着成都与国际顶尖博物馆的合作迈上新台阶,为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注入新的活力。